

# 当代中国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分析

——以涉及领袖人物的电影为例<sup>①</sup>

包新宇 宋震

**摘要:**电影是否对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产生了影响?或者说,电影是否影响了人们对于特定政治权威的政治支持?实证数据及双变量分析表明,就领袖人物题材电影而言,观影程度的确影响了研究样本对于现实中特定政治权威的政治支持。进一步的多变量分析则表明,研究样本向现实中特定政治权威提供政治支持不仅受到了电影的影响,还受到了某些体现研究样本人群特质的控制变量的影响,也正是这些控制变量增强或削弱了我国电影媒介的政治社会化效果。

**关键词:**电影 政治社会化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 实证研究

##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视作一种政治工具,承担着政治教化的功能。195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中指出:“我们的电影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我们的电影应该发挥它的特有效能和巨大力量来动员和组织人民为完成我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下,电影只是一种进行政治灌输的工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电影政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主观性,“为政治服务”始终是电影第一位的目的和功能。

改革开放新时期,“主旋律”的提出<sup>②</sup>明确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电影功能的重新定位,即由电影为政治服务转变为一部分电影在社会生活价值多元化背景下进行特定的政治文化表达。1992年,针对一些人对文艺的功能和目的所存在的片面理解,李瑞环指出:“文艺有娱乐、审美、认识、教育等多方面的作用。我们总是希望并努力争取充分发挥文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但也必须承认,不可能使每个作品都具有这种作用。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在提倡多创作健康有益、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同时,也不反对政治上无害、艺术上较好、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李瑞环,1992:309)。这一时期,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建立,为“主旋律”电影提供了政策上的倾斜特别是资金上的扶植。该专项资金重点资助“党和国家提倡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故事片”<sup>③</sup>,尤其是“表现党、国家、军队重大历史事件,或以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业绩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历史故事片”以及“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为题材的重点故事片”<sup>④</sup>。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导下,1993年初,中国电影体制改革正式启动,投资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电影的产业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也使电影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日趋多元化。

<sup>①</sup> 本文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项目号GD1124)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sup>②</sup> 1987年,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同年7月,经中央批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后正式更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

<sup>③</sup> 参见国务院于1990年12月21日批准的《关于明确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通知》。

<sup>④</sup> 参见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于1991年3月19日发布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暂行办法》。

按照现代政治学研究,政治社会化是特定社会中公民习得政治文化,形成政治心理和人格,建立政治权威观念的过程。学术界普遍认为,电影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之一。但是,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效果究竟有多大?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经验性问题。因此,本文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如下问题:电影是否对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产生了影响?在电影的影响之下,人们政治取向的客观产物是什么?电影是否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要研究的“电影”是指电影故事片。在电影故事片中,政治权威比政权制度或政治共同体的可识别程度更高,因此,从政治权威的角度切入,可以比较有效地分辨出电影故事片在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可能扮演的特殊角色。依此,本文所要研究的“电影故事片”是指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独立或合资出品的以政治领袖、军人、领导干部楷模和村官等不同政治权威形象为主要人物的电影故事片,本项研究将其称之为“涉及政治权威的电影”。在本项研究中,“电影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等值命题是:以特定政治权威形象为主要人物的特定题材故事片是否影响了研究样本对于现实生活中特定政治权威的政治支持?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其相关程度如何?影响这一相关程度的结构性因素有哪些?

## 二、文献述评和研究理据

### (一)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有关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几乎都是侧重于大众“新闻”传播媒介,而对“非新闻”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则极为罕见,电影这一重要的非“新闻”大众传播媒介更是一直处在被遗忘的角落。国内学者中,庄严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庄严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影视文化发挥功能的基本方式、影视文化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基本内容、当前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特征、新世纪影视文化发挥政治社会功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途径等内容。该项研究指出:影视文化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基本内容包括“宣扬社会政治价值观念与政治行为规范、传播和传递社会政治文化”,“促进个体政治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培养正确的政治自我观念”以及“展现政治生活技能、培养政治角色”等(庄严,2003:11-15)。该项研究将新世纪影视文化发挥政治社会功能的基本任务概括为“培植和传播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系统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念”、“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道德水平”、“优化社会政治心理环境”、“提高全党和全民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庄严,2003:25-29)。庄严的这一研究立足于当前中国影视文化建设的实际状况,从影视文化健康发展以及促进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不过,这一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缺憾,其主要体现在:研究以规范研究方法来分析经验性问题,在分析方法选择是存在一定错位性;这一研究对于现实影视文化中不同政治文化内化为人们政治人格之效果的客观性和复杂性也未能予以充分重视。此后的相关研究,大都是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进行的。例如,欧阳沁莹选定电影作为研究对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电影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欧阳沁莹,2003:14-25)。王德顺阐释了影视文化的社会功能,并通过武汉四个校区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影视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提出利用影视文化的积极作用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增强其实效性与时代性的观点(王德顺,2005:19-33)。

从整体上看,我国学者关于影视文化或者电影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袭着教育论、灌输论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进行的。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基本上是将政治社会化视作一个由权威机构有组织地推行政治文化传导的过程,强调政治系统按照某种能够先验的模型来塑造公民,其分析方法主要是从公民对现存政治系统的评价与政府期望目标之间的契合程度来判定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因此,在实质上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实际上,单向度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状态”与政治生活中双向互动的“实然状态”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政治系统教育训练其政治成员的同时,政治成员也会进行有选择的自助式政治学习,而这一能动学习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政治系统所预期的。

反思这一研究状况,我们感到,重视人们在政治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将人们的政治认识和政治学习看作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才能有助于客观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研究。

此外,就电影的社会化功能研究而言,黄会林等对于电影媒介对未成年人社会化影响展开了系列研究,总结了未成年人对电影媒介的接触行为及其特征、未成年人对民族影视作品的审美接受特征和对电影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电影对于未成年人价值观倾向和行为的影响等(黄会林等,2006:82-98;黄会林等,2008a:74-83;黄会林等,2008b:44-53)。黄会林等有关电影社会化影响的系列研究,对本项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项研究以青年群体中的公务员职位竞争者群体为典型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力图客观具体科学地分析“当代中国电影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问题,检索显示,专门聚焦于电影故事片的社会化功能研究迄今尚无先例。

## (二)研究理据

按照现代政治学研究,政治社会化是特定社会中公民习得政治文化,形成政治心理和人格,建立政治权威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体现为一体两面的特点:一方面,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系统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是政治文化的传播、代际传递和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也是政治个体学习政治知识,获得政治取向,形成和完善政治人格,适应政治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对于客观外界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实践基础上主观对于客观的能动的反映过程。因此,政治社会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政治学习过程而并非仅仅是一个“被灌输”的消极接受过程。现代政治学者对于政治社会化的界定比较具有代表性。例如,道森和普鲁伊特(Dawson & Prewitt,1969:5)指出:“政治社会化是公民学习获得的、对政治世界形成一定认识的过程。”伊斯顿和丹尼斯(Easton & Dennis,1980:7)也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

按照政治社会化的进行方式,可以把政治社会化分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和间接的政治社会化(王浦劬,2006:291-293)。格林斯坦(Greenstein,1968,14:551)指出:“政治社会化包括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意的和无意的政治学习。这种政治学习不仅包括明显的政治学习,也包括影响政治行为意义上的非政治学习。”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在间接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所进行的学习,其直接结果是建立某些政治取向,这些取向涉及到对政治权威的信任、信心、好感和政治态度等。阿尔蒙德(Almond,1960:89)认为,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是通过间接的学习过程产生的:“这些经历虽然不是政治经历,但是它们具有潜在的政治影响——就是说,并非是它们有意要产生政治影响,且这种影响也不易识别。”

道森和普鲁伊特的非政治影响理论,也主要是阐述非政治性的间接的政治社会化理论。道森和普鲁伊特在《政治社会化》一书中较早而系统地研究了间接的政治社会化。该书分析了从儿童到青年的政治成熟过程,指出间接的政治学习涉及到“这样一些气质的获得,它本身不是政治的……(但)将来会特定地指向一些形成政治定向的政治对象”(Dawson & Prewitt,1969:63)。他们认为,通过间接的政治学习可以使人“从不同的非政治的经验中获得了使自己在政治世界中立足和发展的技巧和洞察力”(Dawson & Prewitt,1969:69)。

看电影属于日常生活中的非政治性经历,是典型的间接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人们可能通过看电影而获得了特定的社会心理、社会思想和行为取向,并将其移用于政治生活。虽然西方学者关于间接政治社会化的理论,主要局限于儿童或青少年时期的非政治性学习对其以后政治取向的影响。但是,间接政治社会化的理论为本项研究提供了研究理据,拓展了研究思路。

本项研究在确定调查假设变量时,依据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媒介效果研究理论,包括教化研究和储藏箱模型等理论,这些理论与本项研究的实证设计和变量设定直接相关。

教化研究,或者说同化研究(enculturation)的基本假设是:反复地接触某些基调一致的媒介刻画和媒介话题,会促使人们按照媒介所描绘的方向去感知社会现实,他们更有可能高估社会生活中

某些行为的普遍程度,同时也更有可能高估自己受到某些行为伤害的可能性(Gross & Morgan, 1985)。为了进一步阐释和改进教化假说,学者们提出了“共鸣”(resonance)和“回归主流”(mainstreaming)两个新的概念。当人们在媒介上所看到的景象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加强时,受众就会像是服药时服下“双倍剂量”,它所带来的教化效果的增长被认为是“共鸣”所产生。而“回归主流”则是一种趋同性效果,即大量观看会导致人们的观点趋同(Gerbner et al., 1986:17-40)。

储藏箱模型是施勒姆和吉恩(Shrum & Guinn, 1993:436-471)基于个人记忆的信息可达性,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教化过程模型。这一模型假定人的记忆运转就像一个大的储藏箱:每当接受新信息的时候,就会将一份有关该信息的文件放在储藏箱的顶部。之后需要找出该信息进行决策时,就会从储藏箱的顶部一直向下搜索。这样,最近存放的信息和最常被搜索的信息就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回忆的光顾。举例来说,一个收看了大量“涉及政治权威的电影”的人,更有可能把许多夸大的权威刻画储藏在记忆的箱子当中。当他们被要求对社会政治现实做出判断时,那些储藏起来的电影画面最有可能在这些人的脑海中浮现,他们就可能以此来做出判断。施勒姆(Shrum, 1996:482-509)通过一项实验验证了他和奥吉恩共同提出的一个推理:当需要对社会现实做出判断时,重度收看者应当能比轻度收看者更快地做出判断,而其判断也应当更多地说明教化效果的影响。在这一实验中,实验对象中肥皂剧的重度收看者更有可能表现出一种教化效果,而且能以较快的速度回答被问及的教化效果问题。

上述理论构成了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三、假设与调查

本项研究的调查假设是:受到“涉及政治权威的电影”影响越大的人,其向现实中的政治权威提供政治支持的程度越高。本项研究将特定故事题材影片的观影程度视为一种累积性的电影影响(自变量),测量其与政治支持程度(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为了具体地测量调查假设,本项研究把人们对于“涉及政治权威的电影”的观影程度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同时把人们向现实政治权威提供政治支持的程度也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本项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地域性因素、个体的社会政治实践、观影后的感受强度以及观影后的权威性行为强度等。

本项研究选取公务员职业的竞争者群体<sup>①</sup>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这一群体相对年轻,更喜爱看电影。经验告诉我们,喜爱看电影的人更容易受到电影的影响。其次,这一群体作为社会结构中一个迅速壮大的群体,在青年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大,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实政治因素。再次,这一群体以进入权威系统为其职业目标,对于权威的关注程度非常高,对于公共权威的体会和体验也相对深刻,选择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增强研究的典型性。复次,这一群体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判断常常是批判性的,“权威主义的瓦解”成为其个体政治心理的变化之一。伊斯顿和丹尼斯(Easton & Dennis, 1980:304)曾指出:“较之其他年龄群体而言,15-35岁年龄群体更容易形成对立政治权威的倾向。”对于本项研究而言,这种追求与对立、服从与反抗之间的矛盾及其磨合之后的客观产物十分令人好奇。最后,这一群体对于现实中和电影里的政治权威相对比较敏感,其鉴别能力相对较强。预测试表明,这一群体在观影时十分关注电影中的权威人物形象,具有较强的权威主义倾向。

本项研究的分析策略是:在进行观影程度和政治支持程度双变量间相关性测量的基础上,利用Tree分析和详析分析工具,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多变量分析,以揭示原双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实质以及影响原双变量间相关性的结构性因素。

<sup>①</sup> 公务员职业的竞争者群体的主要特征是:18-35年龄段,性别分布均衡,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以公务员为理想职业并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

抽样调查所抽取的样本量为780人,调查在15个城市展开。这15个城市包括:乌鲁木齐、西安、成都等3个西部地区城市,太原、武汉、长沙、南昌等4个中部地区城市,北京、济南、上海、南京、福州、广州等6个东部地区城市,沈阳、哈尔滨等2个东北部地区城市。具体抽样方法为:在每一个被抽取城市,就近选定一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考试笔试辅导班,进而在就近抽样的基础上进行随机抽样,即在各城市被选定的笔试辅导班学员中随机抽取52人,在授课老师和教务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发放调查问卷,当场填写并回收。各城市笔试辅导班进行随机抽取的具体操作步骤是:依据各城市笔试辅导班的具体人数规模,计算抽样间距 $k$ ;从各城市学员报名号或听课证号的全部号码集合中任意选定起始号码;按照实际的抽样间距 $k$ ,在每 $k$ 个号码中选出第 $k$ 个号码;继续数算,直至抽满52个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总计780份,回收问卷767份,回收率98.33%,其中有效问卷763份。

本项研究的样本量符合实证研究的基本要求。据新华社消息,2011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考试通过资格审查人数141.5万人,参加笔试人数90.2万人。本项调查的样本量为780人,样本占总体的比重趋近于0.1%,这与非常简单随机抽样所需的最小样本量(精度要求为:置信度为90%、最大误差范围为3%)所要求的756人(孙江华,2005:95)基本一致。这就是说,虽然本项研究的抽样调查属于非概率抽样方法,但由于样本量比较大且地域分布较为均衡,研究的有效性基本可以得到保证。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的有效性,本项研究特别关注一些社会结构变量对于研究假设的不同影响。在进行测量结果的分析时,通过详析分析工具对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地域性因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个体的社会政治实践等控制变量所进行的条件相关分析,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各种控制变量之于理论假设的影响,进而有助于增强研究的有效性。

#### 四、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之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相关关系?我们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答案,本文仅以涉及领袖的电影故事片<sup>①</sup>为例进行分析。

政治领袖一般是指国家和政治团体的领导人,依照通常的理解,既应包括历任者,也应包括现任者。而调查却发现(见表1),90%以上的被调查者将“政治领袖”理解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只有不足10%的人将现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认同为“政治领袖”。这种对于历史型领袖的高度投射表明:在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看来,政治领袖既不是最高职位的现实占有者,也不是最高职位本身。

表1 被调查者心目中的“政治领袖”概念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sup>②</sup>	680	89.1	90.3	90.3
	现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sup>③</sup>	73	9.6	9.7	100.0
	合计	753	98.7	100.0	
缺失		10	1.3		
合计		763	100.0		

注:问题设计:当您想到“政治领袖”时,您第一个想到的是?

① 在我国,涉及领袖的电影故事片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领袖人物题材电影,二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实际上,领袖人物题材影片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是各有侧重的,前者重在特定领袖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形象刻画,而后者重在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群像。

② 依据频数多少排序,依次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其中填写毛泽东的人所占比例最高,为45.9%。

③ 填写胡锦涛的人所占比例最高,为80.8%。

作为历史题材影片,无论是描绘历史事件和展现领袖群像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还是刻画特定领袖人物形象和描写其生平事迹的领袖人物题材电影,都是对真实领袖人物的历史还原和艺术再现,均与现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无关。因此,本项研究将不同程度的观影者对于领袖的政治支持分析限定为对已故的政治领袖人物的政治支持分析。

(一)被调查者对电影中政治领袖的印象

语义差异量表的调查数据表明(见图1),被调查者对电影里我国政治领袖的总体印象是积极的。在13组对立形容词中,有12组的评价均值都超过了中间评价值4分,只有关于“保守-创新”印象的评价均值低于中间值,仅为3.87分,趋向于“保守”印象。在领袖电影形象留给被调查者的积极性印象中,“有影响力的”、“简朴的”和“有感召力的”印象位居最前列。而被调查者对于电影里领袖人物在公开、民主、沟通等方面的印象评价中,虽然总体上趋向于积极,但却表现出一定的保留性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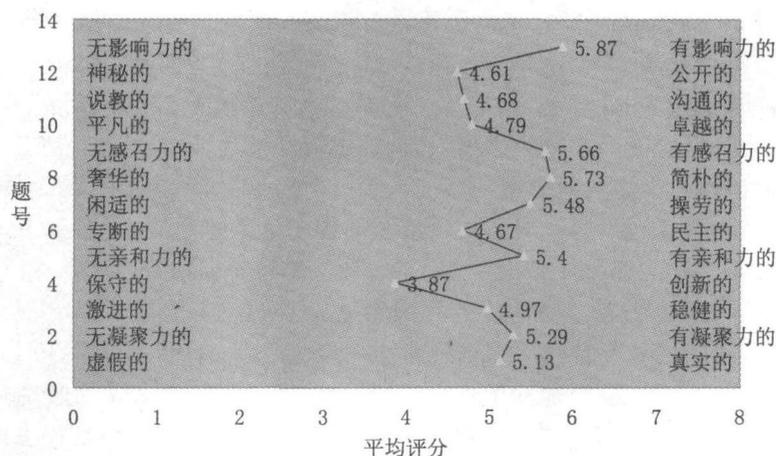


图1 被调查者对电影里我国政治领袖的印象或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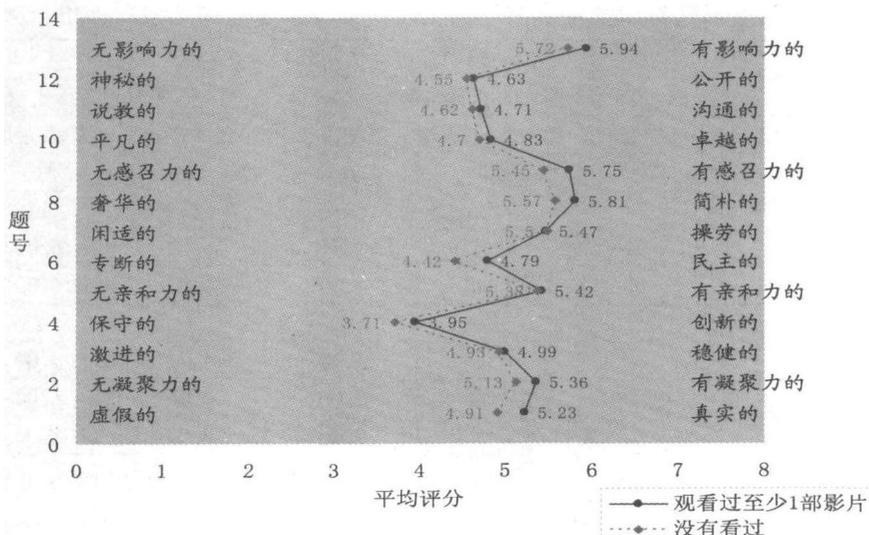


图2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实际观影经验的印象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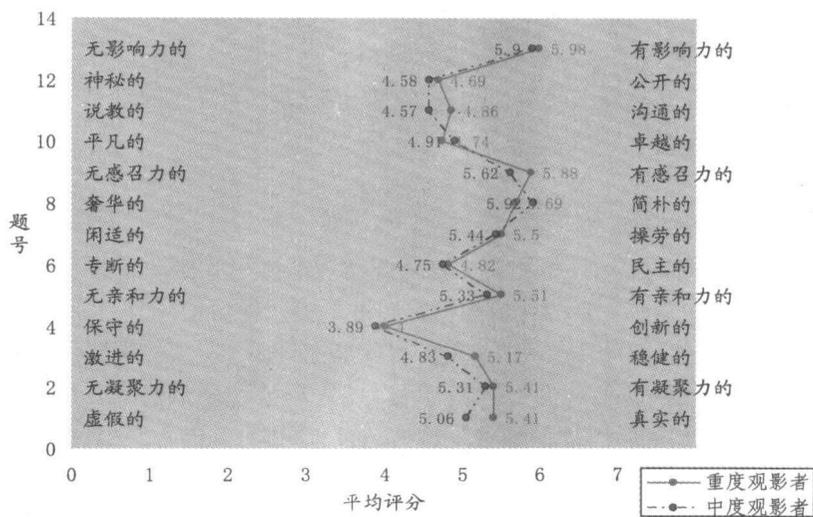


图3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重度观影者与中度观影者的印象差异

进一步数据表明(见图2、图3),看过至少1部领袖人物题材影片的人比实际观影部数为零的人对电影里的领袖人物有着更为积极的印象;随着观影程度的增加,被调查者对电影中领袖人物的印象也随之改善,但更倾向于认为电影里的领袖人物是“平凡的”。这说明,是否具有实际观影事实和观影程度影响了被调查者对于电影里我国政治领袖的印象或感觉。

(二)领袖电影的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的相关测量

1. 对领袖“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信任

对领袖的信任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抽象概念,而只有设置一个较为具体的假设情境,才便于被调查者对领袖进行信任评价。在我国,“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不仅是极具代表性的政治价值观,也关乎我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评价问题。因此,本项研究将被调查者对领袖的信任评价限定为对其“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之相信程度的测量。

表2 不同故事题材领袖电影的不同程度观影者对于领袖的信任评价

		对领袖“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信任程度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轻度观影	中度观影	重度观影	轻度观影	中度观影	重度观影
N	有效	225	260	242	121	315	291
	缺失	17	7	12	13	14	9
	均值	5.91	6.11	7.01	6.02	6.09	6.77
	中位数	6.00	7.00	8.00	6.00	6.00	7.00
	众数	8	8	10	8	8	10
	百分位数						
	25	4.00	4.00	5.00	4.00	4.00	5.00
	50	6.00	7.00	8.00	6.00	6.00	7.00
	75	8.00	8.00	9.00	8.00	8.00	9.00

注:问题设计:您是否相信政治领袖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请在0-10之间挑选您的答案,0=绝对不相信,10=完全相信、毫无疑问)

从表2中可以看出,领袖人物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观影者对领袖的信任评价的均值是随着其观影程度的增加而递增的,呈现为正相关关系。但是,无论是领袖人物题材影片还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评价值的众数和百分位数的分布上,虽然重度观影者的评分均高于轻度和

中度观影者,但是轻度和中度观影者的评价值分布却并无差异。他们评分的众数均为 8 分,即在轻度和中度观影者中,最多比例的被调查者选择了 8 分;而他们评分的第 25 个和第 75 个百分位数分别都是 4 分和 8 分,这就是说,无论在轻度观影者中还是在中度观影者中,都有 25% 的被调查者评分在 4 分以下,而有 25% 的被调查者评分都在 8 分以上。轻度和中度观影者在评价值分布上的一致性表明,领袖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对领袖的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是一种弱相关关系。从表 2 中还可以发现,无论是评分均值的增长幅度,还是中位数分布的变异性幅度,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递增幅度均显然超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递增幅度。这意味着,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相比,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对领袖的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更强。

## 2. 对领袖的政治态度

为了具体地测量被调查者对于领袖的政治态度,研究设定了一个容易引发被调查者联想的假设情境,即领袖在公开场合的演讲或讲话。电影中有许多领袖人物在不同场合进行演讲或讲话的故事情节,如战略决策之前的沟通与说服、誓师检阅时刻的演讲与动员、会议谈判过程中的陈词与舌战、深入群众之时的慰勉与鼓动等,电影中的领袖人物在上述场合的种种发言,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而多数被调查者对上述影像情境并不陌生。因此,这种假设情境的设置有助于测量影像情境的累积与被调查者对领袖的政治态度之间的客观关系。

表 3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对领袖之政治态度的相关关系

积极支持程度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非常同意(高度)	17.6%	26.2	33.9	26.4%
比较同意(中度)	60.8	54.1	51.0	55.0
有点同意(低度)	21.6	19.7	15.1	18.6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n(总数)	(199)	(244)	(239)	(682)
Gamma = .199				
非常不同意(高度)	20.6%	0.0	66.7	12.5%
不太同意(中度)	35.3	38.9	25.0	34.4
有点不同意(低度)	44.1	61.1	8.3	53.1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n(总数)	(34)	(18)	(12)	(64)
Gamma = .362				

注:问题设计:政治领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讲或讲话符合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诉求,对此,您?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对领袖的政治态度之间具有弱相关关系。无论支持的向度如何,被调查者对领袖的态度评价强度都随着观影程度的增加而增强。仔细观察表 3 中百分比的分布,可以发现轻度、中度和重度观影者在政治支持程度上的比例增幅并不明显。在不同程度的观影者中,最多比例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提供中度或低度的政治支持。

与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相比,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对领袖的政治态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对较弱,积极和消极支持向度的 Gamma 系数分别为 0.165 和 0.106。

### (三)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的条件相关分析

由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已经发现的有关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可能是非真实的,粗略的双变量统计分析往往看到的是表面现象,而难以把握事物间相互关系的本质。双变量之

间的相关关系,通常是建立在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在某一种条件下,变量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而在另一种条件下这种相关关系有可能会消失,或转化为另一种关系。因此,有必要对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多变量分析,以获知原始相关关系在不同条件下是否会有所不同。

1. 对领袖“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信任评价值的 Tree 分析

Tree 分析是一种适用于多变量分析的分类分析模式,其核心逻辑是:在设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基础上,依据自变量进行二分,以使分类后的自变量组别中因变量的均值差异最大化,Tree 分析过程在自动排除对最终模型没有显著性贡献的自变量的同时,依据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层次,自动将筛查出的对最终模型具有显著性贡献的自变量按照条件层次进行排列,以体现不同层次自变量条件影响下,不同组别中因变量均值的组间差异。在进行 Tree 分析时,本项研究将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和其他所有控制变量均视为自变量,将被调查者对领袖的信任评价价值作为因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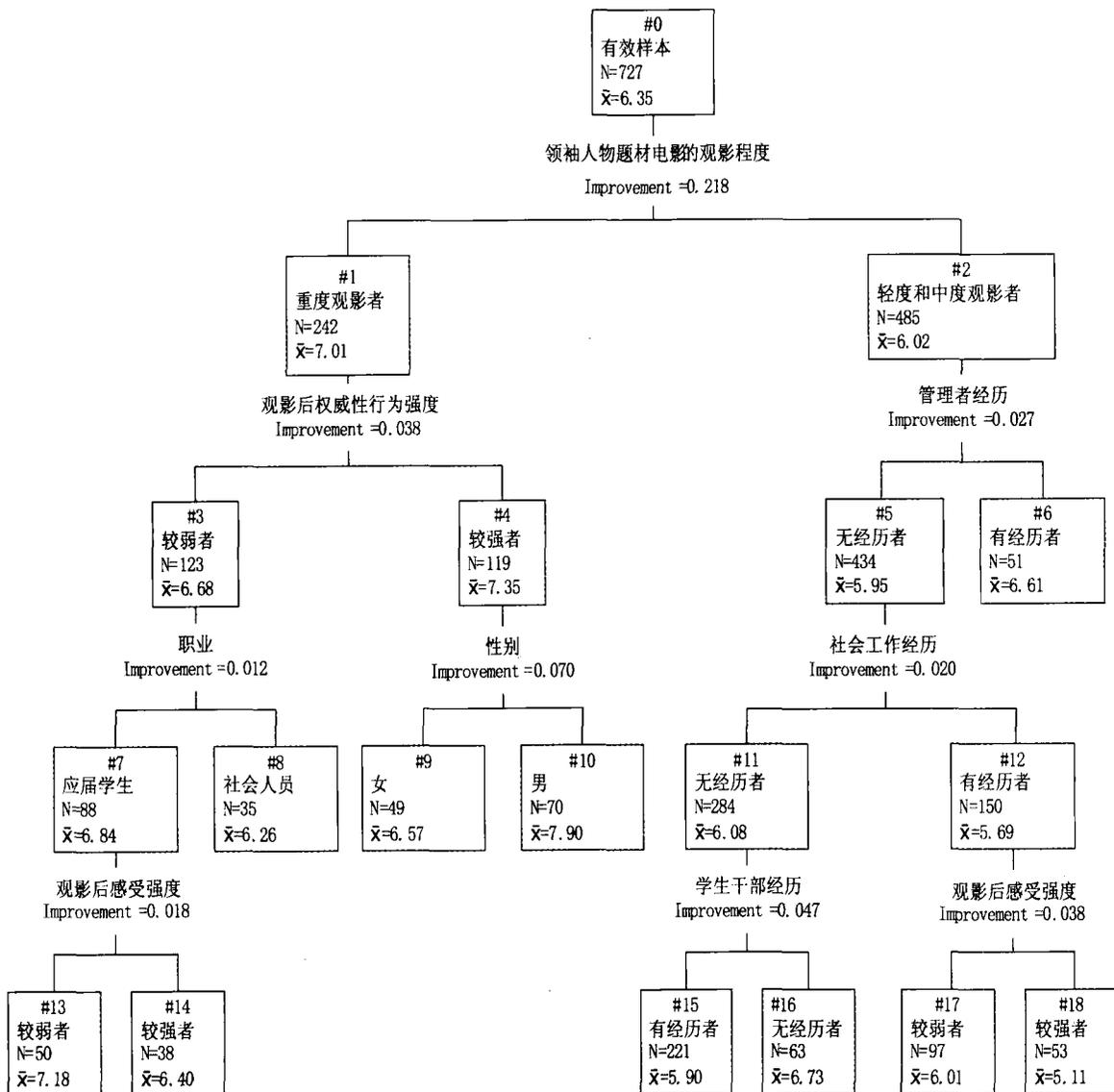


图4 被调查者对领袖信任评价值的 Tree 分析结果

图4显示,有7个自变量对最终模型有显著性的贡献,其中观影程度的影响最为显著。节点1表示重度观影者对领袖“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信任评价价值均值为7.01。与此相反,在节点

2,轻度和中度观影者的信任评价值均值为6.02。有必要指出的是,评价值均值越高,被调查者对领袖“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信任程度越高。这说明,与轻度和中度观影者相比,重度观影者在信任方面向领袖提供的政治支持程度较高。

进一步数据显示,观影之后的权威性行为强度、管理者经历、职业、性别、社会工作经历、观影之后的感受强度以及学生干部经历等控制变量均与信任评价值之间具有微弱的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控制变量均影响了因变量的取值,但这些影响均小于来自于观影程度的影响。这说明,观影程度与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是真实的。尽管被调查者对于领袖的信任评价值也受到了来自于控制变量的微弱影响,但这只能说明,这些控制变量所产生的局部效应是极其有限的。

## 2. 对领袖之政治态度的详析分析

详析范式(Elaboration Paradigm)是一种使调查近似于事后实验设计的多变量分析模式,其核心逻辑是:在初步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用分表法引入控制变量,依据控制变量的类别将样本分组,然后通过比较分表与原始双变量表的方式分析每一控制变量组别中的双变量关系,以揭示原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实质。

表4 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对领袖之积极性政治态度的条件相关分析

	详析分析的分表 Gamma 系数					
性别	男性	.182	女性	.212		
年龄	18-25岁	.189	26-35岁	.281		
职业	学生	.164	社会人员	.296		
受教育程度	大学生	.215	研究生	.148		
学生干部经历	有	.268	无	-.046		
社会工作经历	有	.264	无	.150		
管理者经历	有	.255	无	.192		
地区城市	沿海城市	.240	非沿海城市	.169		
观影后感受强度	较高者	.183	较低者	.168		
观影后行为强度	较高者	.244	较低者	.209		
社会经济地位	较高收入者	.208	中等收入者	.127	较低收入者	.354

详析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表4),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对于领袖演讲之政治态度的积极性支持程度都会随着观影程度的增加而增强,而这种相关关系在女性中相对更强。与性别这一控制变量相似,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工作经历、管理者经历、地区城市和社会经济水平等因素虽然均未使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消失,但却使原变量间关系在不同的控制变量组别中呈现出强弱不同的关系。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在青年后期组别、社会人员组别、大学生组别、具有社会工作经历者组别、具有管理者经历的组别、较低收入者组别以及东南沿海城市的组别中呈现出相对更强的关系。条件性差异尤为明显的是,在控制“学生干部经历”后,研究发现,原相关关系只存在于“有”学生干部经历的被调查者身上,而在没有学生干部经历的被调查者中则几乎没有这项关系。由此可见,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是随着上述条件而变化的,也就是说,上述相关条件变量产生互动效果。

## 五、结论与讨论

经验资料及其分析表明,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当代中国电影的确影响了研究样本对于现实中特定政治权威的政治支持。但是,电影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大。就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而言,研究没有能够在样本数据中发现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之间具有中度以上的相关关系,即使是相对较强的双变量关系,也仅仅介于微弱相关与中度相关之间。

而进一步的多变量分析则表明:研究样本向现实中特定政治权威提供政治支持不仅受到了电影的影响,还受到了某些体现研究样本人群特质的控制变量的影响。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是“涉及政治权威的电影”的观影程度这一自变量独立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之间的双变量相关具有某种条件性,自变量与多个条件性控制变量的互动效果成就了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控制变量的条件性作用效应随着特定政治权威、特定故事题材和政治支持维度(信任、好感、政治态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除观影程度外,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学生干部经历、社会工作经历、管理者经历、地区城市、收入水平、观影之后的感受强度以及观影之后的权威性行为强度等体现样本人群特质的控制变量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因变量的取值。也就是说,上述控制变量与政治支持之间具有某种相关性。这些控制变量与政治支持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已在前文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总体来看,这种控制变量与政治支持之间的相关性使控制变量构成了影响原变量间相关性及其相关程度的结构性因素。具体来说,对于涉及领袖的电影而言,这种影响体现为:政治支持受到了来自于控制变量的微弱影响,但自变量的影响最为显著,观影程度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具有主导性作用。

研究还发现,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相比,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研究样本政治支持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强。这两种电影类型样式均以领袖人物为影片的主要角色,但在双变量相关系数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叙事方式和叙事重点的不同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注重“写事”,以还原再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宏阔历程为主要内容,以“散点透视”的刻画方式展现领袖群像;而领袖人物题材电影则注重“写人”,通常选取特定领袖人物人生历程中的重要片段,采用“焦点透视”的刻画方式,将特定领袖人物的时序经历高度浓缩,通过其他人物的烘托和对比,进而展现其个性魅力和内在精神特质,这种“聚焦”效果可能加深了电影对于观众心理的暗示刺激作用。

多变量分析还发现,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之于领袖的政治支持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对较强;与此相反,领导干部楷模电影的观影程度与被调查者对于领导干部的政治支持之间则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这种聚类的数据结果表明,“涉及政治权威的电影”之于被调查者的影响力可能与被调查者和现实中相应政治权威的接触方式有关。领导干部是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或可能接触到的政治权威,属于日常型政治权威。人们对于领导干部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可能更多地源自于社会政治实践或亲身经历,而不仅仅局限于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因此观影者能够很轻而易举地将电影里的权威形象与现实中的相应权威加以区分。相反,位于政治系统制高点的领袖则属于神秘型政治权威,他们疏离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神秘而高远,被调查者对于他们的接触方式更多地表现为间接性接触,依赖于从大众传播媒介获取相关信息。领袖人物题材电影中那些具有解密性质的情节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电影里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特质的领袖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给予观众以替代性经验,电影所营造和建构的虚拟真实几乎取代了现实真实,使观众认“假”为“真”,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领袖的政治支持。

电影所展现的生动影像之所以难忘,原因在于它比纯粹的口头或书面语言更能唤起强烈的情感反应,其独特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机制在于催化观众内在情感的共鸣,进而促使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影片中的政治权威人物和政治价值。因此,电影政治社会化效果的产生,决定于电影能否唤起观众的情感。而这种特殊催化机制所作用的情感客体通常并不是人们的政治情感,而是那些人类普遍拥有的生活情感。领袖人物题材电影之所以相对成熟并具有相当的教化效果,可能是因为领袖人物题材电影通过“父子情”、“夫妻情”、“友情”、“亲情”等人类最基本的共有性情感体验,拉近观众与领袖人物的心灵距离,以情感的共鸣,加强心理上的情感体验和内心对领袖人物的情感认同。与领袖人物题材电影相比,我国领导干部楷模电影的教化效果之所以几乎为零,不仅因为这类影片负载了过多的抽象形式和复杂而不着边际的象征意义,更是因为这类影片把人的亲情伦理与社会政治责任进行了二元对立式的处理,“要么在家庭里做一个好父亲,要么在单位做一个好干部。两者不可兼得”(贾磊磊,2006:41-46)。美德主义的干部楷模形象完全超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常

理,颠覆了权威人物的现实合理性,间离甚至破坏了电影作为一种戏剧形态的假定性,反而使观众认“真”为“假”。

尽管调查数据和统计分析支持了本项研究的调查假设,但是限于时间、财力和物力,本项研究仍然存在特定的局限性:调查研究可能无法提供观影程度与政治支持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所需要的确切证据,因为任何调查都无法测定所有可能的变量,即便设计最为细致的样本调查所获取的“确切”证据,仍然难以让人信服。尽管研究者进行了多变量的条件相关分析,但是,Tree分析和详析分析的价值及其数据结果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择的控制变量。然而,Tree分析和详析分析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引入什么样的控制变量,这往往依赖于研究者自身的经验和对于研究问题的理解。因此,这样的可能总是存在,即一个未经测量的变量,恰恰是解释两个已经测量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关键。这些固然是本项研究的缺憾,但是,它们实际也显示着本项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在本项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民族、宗教、党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文化水平等控制变量引入到多变量分析之中,进一步挖掘和分析各种条件变量之于数据聚类模型的贡献以及其在影响层次上的差别,从而可以对观影程度和各控制变量之于特定群体政治支持的不同作用力进行比较。

#### 参考文献:

- 黄会林、刘琛、刘硕、喻溟、李瑞华、朱毅飞,2008,《电影媒介/文化对未成年人社会化影响的调研与思考》,《当代电影》第12期。
- 黄会林、刘藩、许波、赵玉琦、王淑梅,2008,《“电影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研究报告》,《艺术评论》第10期。
- 黄会林、吕益都、陆彭、申彩虹,2006,《电影媒介/文化对未成年人社会化影响的调研与思考》,《电影艺术》第11期。
- 贾磊磊,2006,《中国主流电影的认同机制问题》,《电影新作》第1期。
- 李瑞环,1992,《繁荣文艺必须解放思想——在内蒙古乌兰牧骑艺术节闭幕式上的讲话》(1992年8月10日),《李瑞环同志关于文艺的讲话选编(1984年-2002年)》。
- 欧阳沁莹,2003,《试论美国进口影片对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孙江华,2005,《媒介调查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
- 王德顺,2005,《影视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影响的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浦劬,2006,《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小丽、徐牲民,2004,《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 庄严,2003,《试论21世纪影视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Almond & Coleman 1960,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vid Easton & Jack Dennis, 1980,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nstein 1968,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David L. Sil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 Y.: Macmillan.
- Gerbner, G., Gross, L., Morgan M., & Signorielli, N. 1986,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dynamics of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In J. Bryant & D. Zillmann(Eds.), *Perspectives on Media Effect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Gross, L., & Morgan, M. 1985, "Television and Enculturation", In J. Dominick & J. Fletcher(Eds.), *Broadcasting Research Methods*. Boston: Allyn & Bacon.
- R. Dawson & K. Prewitt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 Shrum, L., & O'Guinn, T. 1993, "Process and eff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3).
- Shrum, L., 1996,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underlying cultivation effect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4).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中央戏剧学院艺术管理系  
责任编辑:陈 昕